

邻苏访书震惊东瀛

刘 昌 润

杨守敬（1839—1915）先生在日本访书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先生字惺吾，一作星吾，别号邻苏。湖北宜都人，后卜居黄州，常住省城武昌。其藏书室名有邻苏园、观海堂、飞青阁。藏印有“观海堂”朱文方印、“飞青阁藏书印”白文方印，其在本国所得书则钤“惺吾海外访得秘笈”朱文大方印。

先生出身商贾之家而家境不丰。幼丧父，母为课字，八岁始入学读书，十一岁失学习商，而好学之志不减，晚间仍苦读不辍。乃祖悯其志坚，始允再就傅入学。积学既久，心仪乾嘉学人治学精神，留心学问。清同治元年（1862）中乡试，时年24岁。后尝六赴会试皆不中。先生在京时已饮誉当时，与谭廷献、李慈铭、袁昶诸名士交往，眼界大开，于是绝意科举，苦研实学，勤于博览，多所通识；尤其精于历史地理、地方史志、金石碑版、版本目录诸学。书法刚劲古拙，为世所重。先生著述等身，更致力刻书流传，为近代著名的文史学家，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景仰。

清光绪七年（1881），先生应清朝驻日本公使何如璋招请，由上海赴东京任使馆随员。时何氏即将卸任，先生随员名分未定，继任许景澄因丁忧在家，不能到任，先生乃得利用间暇遍游

东京书肆。当时正值日本维新，推行资本主义改革运动，朝野上下提倡新学，崇尚欧美，蔑弃国文汉学，视古籍为敝履，公私藏书大量流入书坊，甚至成捆论斤出售。先生早在中举后一年，即曾在北京琉璃厂买得武汉三镇难得买到的书籍数万卷，用一辆三套马车运回家乡，对于古籍心明眼熟，早有卓识；及见东京书肆流散诸书中颇有中土久已失传的珍秘，遂萌发了在日本搜访古籍的心愿。

先生尝草拟《日本访书缘起条例》，记述日本所藏汉籍传播源流、公私藏弃概况，以及重要典籍的学术价值，以为有目的有步骤搜访古籍的肇划。后为继任公使黎庶昌所见，极为击赏，大受感动，遂决意在日本搜访逸籍，并将罕传善本影写上板重刊，辑为《古逸丛书》，由先生全力董理其事。先生为此殚精竭虑，不仅绝大部分跋文出于先生之手，且时时要与日本刻工研究镌刻，庶能保存原槧神韵。其用日本美浓纸初印的单行本，镂刻精雅，与原本纤毫不移，几可乱真。日本人固已叹为观止，即国内诸藏书名流见之，也认为其精审可与黄丕烈《士礼居丛书》骈驾，为士林所重。《条例》经反复修改后，收入《日本访书志》题作《缘起》。

先生本寒士，书价虽廉，如放手收书，究竟难以为继。幸行囊中所携古钱、碑帖、古印甚丰，为日本人所艳羨，得以与之交流互换。又与日本汉学家森立之交深，森氏富藏书，精书志学，尝与涩江道纯等人据狩谷望之叙录日本所藏汉学古籍的初稿，续为搜访补辑，增订成《经籍访古志》六卷，附录医书一卷。及先生访得《访古志》传钞本，因得按目求书。日本明治十八年(1885)铅印本即从此出，1916年，徐氏又据以重排。日本现藏明治印本有先生识语云：“此书即据守敬故得钞本，乃假森氏言系偷钞，此段日人深笑之。不知森氏在时与守敬最密，守敬所得书大半是森氏所藏”。（见1923年日本《书志学》第9卷第1号长泽规矩

也《杨守敬〈日本访书志〉考》引）同时先生又得狩谷望之所为之《留真谱》，更具按图索骥的效果。

当时森立之经济困难，拮据“落魄”甚（长泽规矩也语），鬻书以济日费，故所求多半能如愿以偿。其不能得者又多方请人影钞。同时又与向山黄村、岛田重礼、柏木政矩、木村正辞、寺田弘、町田久成……诸藏书家交游，并有岩谷修、日下东部作、冈千仞等人介绍，得以迂购于藏书之家，其出于《访古志》之外者又达数百种。至若书肆所得则与东京琳琅阁书店交易为多。

先生倾力求书，备极辛劳，白天接待来访的日本学术界人士，公务繁忙，又要监刻《古逸丛书》；夜则校勘书籍，品评甲乙，撰写校记与跋识，几乎刻无宁晷。日本报纸作专访，诧为万夫之禀，精力过人；而走生搜访的热情毫不因此稍减。难得之书除影钞外，还益以摄影拍片。于无法借得的书，虽影写首尾一二叶也视为拱璧，编成《留真谱》初二编，是为我国书影图录的滥觞，较之狩谷望之之辑何止信蓰。

先生为偿付书款几至罗掘俱穷，如黎庶昌付定金购宋刻《大藏经》一部，因书商未按时送达而改购《朝鲜藏》，及至《宋藏》运来不能成交，对方又不退定金。黎氏劝先生留下，先生以款钜不得不以俸钱作抵。又如先生访得宋朝黄唐刊《尚书注疏》在大阪藏书家处，是人间孤传种子，数四议价，卖家居奇不谐。后在归国途中遽尔下车，专程赴大阪拜访，终于破悭收得。这种逾乎常情的求书热忱，几至被人目为痴魔。楚北忿忿生于厂肆得明治本《访古志》中识云：“庚子（1900）闰秋中浣得之，册面有守敬跋识，意即今所谓杨疯子者，洵博雅君子也。……”

先生访书旨趣在于流传，希望将中土久佚的孤本重归故国，化作千百万身传播士林。他在日本所收旧钞本《论语》和《孝经》不下十数部；并在日本刷印国内久无传本的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数十部归国；虽不免有博利之讥，却为渴求佚书的学人造福非

浅。后来以宋监本《论语集解》、照相本《尚书正义》分创转让章寿康、李盛铎时，事先均约定日后务必重新翻刻以广流传的不情之请。先生还提倡翻刻有裨实用的书籍，认为儿童的天折不关天命，乃医药不周和失误所致，呼吁有力者刊刻童婴医书。归国后，劝说关棠将万希槐《十三经集证》、陈诗《湖北考古录》（即《湖北旧闻录》）刊入《湖北丛书》而未果，在指摘《丛书》选书不当时感叹说：“失此不刊，不独为吾楚惜，亦为天下学者恨。”又说：“……于大雅宏通之作乃熟视无睹，使他邦学者谓吾二百年来撰著仅如斯，是谁之耻也。”言语激切，表露了先生的心声。

先生跋文多半撰于在日得书之时，时间仓促，字迹不工，钩乙满纸，几至难于辨识。归国后续有补写，始陆续请人誊清。诗稿尝取对原藏，注有书橱《千字文》编号，其严肃不苟者如此。归国后10年始整理旧稿编为《日本访书志》16卷，丁酉（1897）开雕，历时4年刊成。在刊刻过程中，事已为国内学术界所风闻，争向先生索阅，先睹为快。因此不得不将已刻成跋文粗略编纂，尽先刷印若干部分赠同好。扉叶题“日本访书志初编”，叶背题“光绪辛丑（1901）”，盖尚有续出“二编”的打算，亦有以此与《留真谱初编》相应之意。检先生赠柯逢时的初印“辛丑本”，无目录，无《缘起》，少跋文九篇及王子安逸文，书口刻有各书部类，部分叶码亦有留作墨钉未刻者，书中且有多处朱笔校改字句，与后印本同。时先生已63岁，丧偶，料理营葬之间又忙于刊刻其他书籍；年事既高，襄助乏人，精力无从兼顾，“续编”之计，势成虚愿。因就原板改刻修订文字，增入跋文九篇，编定目录，加刻《缘起》，剝去书口部类，重编叶码，扉叶改用原光绪丁酉乃婿黄志孚的题签，不用“初编”之名，作为定本。此即何以丁酉本反较辛丑本为全的原因，同时也可说明未刻入《访书志》的跋文当不在少数。

后来王重民先生从故宫博物馆所藏观海堂藏书中辑得跋文46篇为《日本访书志补》，其中虽已属入国内所得跋文，但极具录略学价值。笔者因仿《王补》例，又从重庆图书馆所藏先生残稿及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、《适园藏书志》……诸家藏书目录中辑得逸跋23篇，作为《续补》，附入拙撰《日本访书志校注》中。连同丁酉本235篇，共得304篇，但较之先生所撰，当仍有差距。正如孙楷弟先生在《王补序》中所说，先生跋文究竟有多少难作定论，只得随见随收了。

日本汉学家长泽规矩也先生说，先生在日本得书多达“五车”，估计数量当不在十万卷以下。以如此巨大数量的古籍归之先生行篋，运出日本，兼之又在日本大规模翻刻逸书，势必引起日本学术界有识之士的严重注意和巨大震惊。先生在明治铅印《访古志》中有识语云：“……俟《访书志》成，而知守敬苦心搜罗为日人所惊讶也。”事实正如所料，日本学人于惊诧之余，方始意识到当时蔑弃汉学文献，视古籍为敝履的不智和失策，耿耿不能去怀。于是起而竞相搜求，甚至西洋人也参与了竞买行列（如朝鲜活字本《文献通考》、旧刊《山谷诗注》等，见明治本《访古志》先生批注）。一时书估居奇，两三年内书价腾贵，即通行明刻本也几与前此之宋元旧刊相埒。

《日本访书志》刊行后不过六、七年，经岛田翰、重野成斋等人的介绍斡旋，由岩崎弥之助出资白银10万两，将吴兴陆心源丽宋楼、十万卷楼、守先阁的藏书全部收归日本静嘉文库。按岩崎弥之助为日本三菱财团第二代首要人物，痛感日本人因一时偏重西学而轻视汉学，以致珍贵文献大量流失的惨痛教训，决意倾力搜集古籍，并于1892年在东京建立静嘉文库作为藏书之所。岩崎氏挟其雄厚财力，不数年即收得古籍不下10万册；既得陆氏全部收藏后，遂成为日本私家藏书的巨擘。其事在先生访书之后，显然可以看到访书所造成的影响何等深刻。

島田翰也是日本的书志学家，熟于汉学古籍源流，撰有《古文旧书考》。其初极力贬低陆氏收藏的价值；及岩崎氏捆载东去后，撰《皕宋楼藏书源流考》，乃曰：静嘉之藏“如访酉阳之逸典，如发委婉之遗文，如紬金匱石室之藏，如探天禄天台之秘，……何其盛也！……若以皇国（指日本）出于隋唐之钞本，加之以海外宋元旧槧、名钞、名校，乃我邦所缺二部，然后藏书之能事始毕，而吾生平之素望尽于此。何意当我世而见，不亦人世间大快事乎！”志满之情，溢于言表。按当时他们流行的说法，算是报了先生访书的一箭之仇。

此事当然也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反响，无不扼腕痛惜。或斥当局处事颛顼，主张赎回；或怨陆氏后人之不守，深为叹息。董康跋《源流考》甚至发出决绝的呼声，如其归于异域，“反不如台城之炬、绛云之烬，魂魄犹长守故都也。”又见日本书商鞏金来华，恐瞿氏、杨氏、丁氏之藏，蹈其覆辙也。

事隔40年，长泽规矩也在论及此事时，还认为先生和森立之都工于心计，是手段狡黠的“敏腕”，是难兄难弟。先生固乘森氏潦倒窘迫之虚，却也费了不少的周旋折冲功夫，言下犹扼腕不已。可见先生访书所造成震惊和影响之深而且久远了。

先生出于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热爱，以一个寒士，耗尽精神财力，执著搜访佚书，为后人留赠文化遗产，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，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写下了光采照人的一页，足以长我志气，激励后学，令人深切地怀念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武汉市商业经济研究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